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沈晓敏 著

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沈晓敏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ISBN 7-108-02158-7

I. 处… II. 沈… III. 议会-概况-浙江省-近代
IV. D6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209 号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获得 985 和 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责任编辑 张 荷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 数 317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解 说

桑 兵

一

美国学者任达 (Douglas R. Reynolds) 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李仲贤的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一书, 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争议, 包括本人在内, 对其观念和材料方面的种种局限议论较多。^{〔1〕} 不过, 作者指出了以下的重要事实, 即新政前后, 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 此前为一套系统, 大致延续了千余年; 此后为一套系统, 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 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1〕 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 1898—1912: 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新 4 期, 1998 年。

“在 1898 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 12 年后,到了 1910 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 1910 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 1925 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 1910 年和 1898 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也就是说,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强调在此过程中日本影响的主动与积极一面。对于诸如此类的看法,意见当然难期一律,表达异见十分正常。但任达所陈述的知识与制度根本转变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不宜轻易否定的。

不过,这一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因为它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

〔1〕《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215 页。

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中国知识人也大都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不是单纯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其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人们很难正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习惯于这些体系的今人，要想进入变化之前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难，即使经过专门训练，还是常常容易发生格义附会的误读错解。不仅如此，甚至要认识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尽管处于同一时代，但要分辨那些约定俗成、不言而喻、实际上各说各话的话语，如果不能从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理解把握，也很难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来学人所批评的“倒放电影”和所主张的“去熟悉化”，^{〔1〕}显然都由此而生。

同样，体现和规范今人的行为，维系社会有效运作的各种制

〔1〕 前者为罗志田教授屡次论及，后者见王汎森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4卷4期，2003年。

度,与百年以前也是迥异。这些制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教育、金融、司法、医疗、治安、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除了少数“仍旧”或“全新”的制度外,多数情况是“古已有之”而“变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这就导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种种行为方式和运作模式,又无法深究今日各种制度规定及其运行的来龙去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结果,一种制度之下存在着多种行为样式,甚至主要的样式与制度本身的原意相去甚远。有时观念与制度之间发生离异,观念层面的优劣之争并不影响制度层面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医的是非优劣,历来争论不已,至今只能说是各有高下,但医疗和医院制度,几乎完全按照西洋方式。

何以会出现上述情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基本面貌的产物。换言之,这是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今人争议甚多的全球一体化,仍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简单,也就不难认识。实际情形不仅复杂得多,而且潜移默化,令人习以为常。所谓“世界”,其实仅仅存在于观念形态,如果要落到实处,则几乎可以断定并不存在一个笼统的“世界”,而具体化为一个个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所谓“世界”,并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集合,实际上主要是以同样笼统的“西方”为蓝本和基准。在“西方”人看来,“西方”只是存在于东亚人的观念世界之中。认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欧美之别,欧洲内部还分为大陆和英伦三岛,大陆部

分又分成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的众多国家。此外,本来是东亚一部分的日本,因为学习西方比较成功,脱亚入欧,似乎也进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而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就知识系统而言,不仅“西学”,还有“东学”。而“西学”的基本凭借“西方”既然只存在于观念世界,“西学”相应地也只有抽象意义。一旦从笼统的“学”或“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学说,可以发现,统一的西方或西学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了,逐渐显现出来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发生而来的独立系统。各系统之间或许大同,但也有不少小异,这些小异对于各种学科或学说的核心主干部分也许影响不大,但对于边缘或从属部分则相当关键,往往导致不同系统的学科分界千差万别,从而使得不同国度的不同流派关于学科的概念并不一致。来龙不一,去脉各异,不同国度的同一学科的内涵也就分别甚大。大者如“科学”,英法德含义不同,小者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分科与涵盖,欧美分别不小,欧洲各国也不一致。至于社会文化研究,究竟是属于社会学的领域还是人类学的范畴,不仅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同一国度的不同学派也认识不一。

上述错综复杂是在渐进过程中逐渐展开,因此对于亲历其事者或许不成问题,而后来者或外来人则难免莫名所以,无所适从。当由欧洲原创的人类知识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走向全球时,为了操作和应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复,简化约略,使得条理更加清晰。这样一来,原有的渊源脉络所滋生出来的纠葛被掩盖,学科的分界变得清晰起来。将发源于欧洲的各种学科统一分界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后续加工,开始不过是有利于缺少学术传统又是移民社会美

国人便于操作,后来由于美国的实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甚至成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为不少后发展国家接受外来影响的主要模式。可是,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时,失去了渊源脉络,但从定义出发,一般而言也无大碍,仔细深究,尤其是还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和笼统。因此,格义附会、似是而非的现象不仅多,而且乱,看似异口同声,实则各唱各调的情况比比皆是。

西方压力之下发生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如果只是全盘西化式地移植,问题也就相对简单。可是,中国的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活力十足,一以贯之,始终活跃,其巨大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于近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清季民初,是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的重要时期,众多学人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严复、宋恕、王国维等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则更多的是从教育的角度关注分科。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西学,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的体系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加之在中国变动的同时,欧洲各国的学科体系也正在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分类的不断增加,随时新建、调整或重组,时间的接近加剧了空间移动的复杂性,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对于学术分科的理解与把握的难度,也导致了分科界限的模糊与错乱。早在20世纪初,主讲京师大学堂史学的陈黻宸比较中西学术时就认为:“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

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1〕这显然是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中西学术的结果,将近代等同于西方,以为西学的优势从来如此。其实,整体而言,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事。由于各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分科边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对西方本来就缺乏全面深入认识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把握这些舶来的抽象物。

上述难题,几乎所有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都会共同面对。而中国还有其独特的问题。在中国的近邻,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向中国人展示了它的巨大成效,以至于新政期间,在朝野人士的鼓动下,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这样的取径,在具有留学欧洲背景的严复看来,不仅是舍近求远,甚至会南辕北辙。他说: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知而不好学者如此者乎?侏儒问径

〔1〕《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献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页。

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1〕

严复的意见在一段时期内似乎不被普遍认同，但它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化的西学，加入了许多东亚因素，而东学所带有的浓厚的德国色彩，提醒人们进一步抛弃西学的笼统性，关注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文化系统，并设法弄清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异。

知道分别就会有所取舍。在大规模地接受东学之后，朝野人士对东学东制移植中土暴露出来的弊病逐渐有所认识，于是再度将目光转向欧洲。从这时起，国人开始跳出西学的笼统观念，不一定在不同系统之间作整体性选择，而是考虑各个系统的具体部分可能各有长短，应当具体地予以了解和把握。民国以后，虽然留美学生渐多，知识人士还是知道，欲求高深学问，还是要去原创性的欧洲。只是后来北美与东欧的影响日益增强，将已有的复杂因素变得看似简化。

在近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其行为规范也随着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制度的引进而悄然变更。西制进入中国并导致原有的各种制度发生变动，与西学的进程相近似，也经过了取法日本的阶段。在此之前，这方面的进展相当缓慢。新政时期，中国全面模仿日本，朝野上下，先后派出了为数众多的官绅游历，他们出发前以及抵达日本后，要集中听讲学习，有关方面为此还编制了具体的考察指南，指示考察的程序、步骤和做法。游历们按图索骥，将日本的各种制度一一照葫芦画瓢地搬来中国。当然，后来同样有过再向欧美学习以调整偏差的经历。其间有些先见之明人士并不囿于一途，如孙中山对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就不以为然，而倾心于瑞上的直接民主。

〔1〕《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61页。

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学界往往会用现代化的解释框架来加以认识。现代化的观念,未必不能成为一种解释模式。不过,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之类的两级范畴,最终实际上落实到了中西对立的概念之上,不仅是简单地找变化,而且所找出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西化。而转型绝非如此简单,至少应该考虑到:1.中国固有的知识与制度体系的渊源、变化与状况。2.外来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具体形态及其进入中国的过程、样式。3.中国人如何接受外来的知识与制度,外来知识及制度如何与中国固有的知识及制度发生联系。4.在上述过程中,本土与外来的知识和制度如何产生变异,形成怎样的新形态。5.这些变异对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制约性影响。

总之,希望通过这一大型研究计划的展开,可以大体把握住中外知识与制度转型之前的情形,外来知识与制度进入中国的过程,由此引起的变化、变化所造成的状况以及发展趋向。

二

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全面变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而且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在面对过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现行思维行为方式去观察判断,如果没有充分自觉,难免用后来外在的尺度去衡量,难以体察理解前人思维行为的本意真相。也就是说,外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进入之前,中国人已有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在转型之后,要想了解本来,反而变得相当困难。要做到不带成见从无到有地去探究发生、发展和变化,首先必须对本

来的情形有充分的了解同情。

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是中西交汇,除了必须认识中国固有,对西的一面也要认真探究,而且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了解,应当回到那一时期去,追寻各种知识与制度变化发展的渊源脉络,以免受后来完善化体系化观念的影响。关于此点,近代学人围绕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颇有启示意义。1928年,张荫麟撰文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焚耳。”^{〔1〕}这里虽然讲的是中国,实则西方也有类似情况。如欧美学者的社会学史,一般是将斯宾塞的《社会学》作为发端。其实这也是社会学家的倒述。严格说来,斯宾塞那本标名《社会学》的著作,更近似于今人所谓社会科学。而在几乎所有欧美人撰写的社会学史中找不到位置的甄克斯,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眼中,却是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学家,影响了众多中国人对社会和社会学的认识。

当然,最为复杂的还是变动不居的阶段。一个本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认识(至多是约定俗成)的外来概念进入中国,常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接受过程,而且接受者各自以其原有的知识进行判断和理解。其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人也会

〔1〕 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表述各异。而同一表述之下,有时各人的意思大相径庭。一个学科同样如此。西式近代分科因民族国家的传统渊源而千差万别,进入中国后,对应于中国固有学问的何种门类,开始往往五花八门,后来虽然逐渐统一,其实还是各说各话。等到中国的固有分类被外来替代(实则很难对应),或者说按照西式分类的观念将中国的固有学问加以比附,却又出现了用西式分类看待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合适的问题。如哲学,开始一般对应到诸子,可是后来傅斯年却提出古代中国无所谓哲学,连思想一词也要慎用,因为概念不仅仅是符号,由此可以引起极大的误解。比如用今天通行的美术概念去理解梁启超在戊戌前所主张的工人读制造美术书,^{〔1〕}只能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张荫麟等人对胡适、冯友兰等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批评,主要也是针对后者用西洋现代系统化的哲学观念去理解或解释中国古代的精神世界,难免格义附会,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直至今日,中国学人仍然在为诸如此类的差异而感到困惑和困扰,而那些没有困惑与困扰者,并不见得比他人更加清醒,或许刚好相反,从现有的知识来理解前人,已经将现实视为天经地义,从而失去了怀疑的自觉。如有的评论者指那些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是以西方为标准,殊不知中国非有哲学不可,同样是一把西学的尺度。后来熊十力即批评西方人认为中国无哲学,不无矮化中国学术之意。了解近代学人何以会有上述观念看法,以及他们彼此讨论的具体语境,有助于理解问题本身。

中国古代已有现代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除习惯于附会者

〔1〕《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52—54页。

外,当然有些匪夷所思。其实,连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存在分类,学界尚有争议。民国时宋育仁从学制改良和国学教育的角度,断言“经史子集乃系书之分类,不得为学之分科;性理考据词章为国学必要经历之程,而非人才教育专门学科所立。”“北京大学立经学专科,外国学校有历史分科,讲求国学者,因此遂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分配为教科。孔经为欧美所无,而彼中大学五科有道科,以其教经为主课;日本大学立哲学,以孔经立为哲学教科。夫四部乃分布书类之名,非支配学科之目。”^{〔1〕}不过,古人治学,虽然不讲分科,而重综合,不等于学术没有分别。经学、史学的名目,由来已久,诸子学也有数百年历史,至于集部,实际是文学,只是古人的文章之学,与今日的文学概念不同。晚清那一代新进学人,努力将中国固有学问与西学对应,很少怀疑这种对应是否合适,因此附会之说不在少数。到了民国时期,不少人意识到简单对应的牵强,但已不容易摆脱分科概念的控制。时至今日,分科教育和分科治学的现状,早已将古代中国的学问肢解得七零八落,壁垒森严了。

考古的概念和考古学的分科,不仅在转型过程中困扰着近代中国学人,即使在此之后,认识与理解仍然因人而异,令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的新锐学人还在为中外考古学的发展趋向明显两歧而大惑不解。一般而言,欧美考古学的主导趋向是离开文献,或者说是要补文献的不足。章太炎对此有过整体性的评论,他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

〔1〕 芸子:《国学学制改进联合会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7期,1923年;宋芸子:《国学研究社讲习专门学科》,《国学月刊》第17期。

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1〕}所以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承担印证文献记录的使命。加之中国本有金石器物学传统,与考古学不无近似,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古一词更多的是在考证古史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所谓古史,固然也指上古历史,但更主要的是历代典籍对先民历史的记载。这也就是具有留学背景的近代学人所批评的,中国旧式学人的研究重心在于古书而不是古史。由于这一取向较易与金石学传统沟通联系,所以金石学者一直在考古学界扮演重要角色。1930年代在北平成立的考古学社,主导的取向就不一定是掘地,而1920年代在古史辩论战中,李宗侗等一些学人主张由考古发现来解决问题,正是寄希望于掘地。其实,即使掘地,学人最有兴趣的仍然是发现埋藏在地下的文献。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到底所谓地下还是文献,而不是用实物证文献,更不是用实物重建历史。直到1980年代重建考古学会,担任顾问与担任理事的学人取向依然有所不同。这种固有学术传统的制约作用不仅发生在中国学人身上,深受中国学术熏染的域外学人也会近朱者赤。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晚年甚至宣称:东亚考古学应当是以器物为对象的学问,几乎认同金石学的理念。更多地接受欧美现代考古学影响的李济批评梅原末治开倒车,实则毋宁说梅原的转向是由于对东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因而改变了单纯以欧美考古学

〔1〕 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108页。

为准的观念。^{〔1〕}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前述的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才开始乾坤颠倒。此后中国的知识概念大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此事已经引起海内外学人的长期关注。不过,所谓明治后的“新汉语”,并不一定是日本人的发明,尽管前人也察觉到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但最值得注意的却是,这些新汉语中相当一部分本来源自中国。例如国民,十余年前日本学人已经注意到,1880年王韬等人著述中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与中国原有的国民含义大不相同。近来又有学人发现,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民”一词。哲学一词的出现,同样是中国先于日本,并且时间要早得多。当然,这些新名词大都并非单纯国人的贡献,往往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上的用途,而和他们身后的中国助手一起逐渐发明出来。虽然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但如果以为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日本引进,则不仅有时间先后之别,对于过程的理解也会大受影响。

诸如此类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在制度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因为作为人与社会的行为规范,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全以西人现代观念对待,难免陷入科学与迷信、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

〔1〕 参见斋藤忠:《考古学史の人びと》,东京第一书店,昭和60年;角田文衛:《考古学京都学派》(增补),东京雄山阁,1997年。